

#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左福生

(重庆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中心,重庆 401331)

**摘要:**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分类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佛教;类化;类书;类编诗文集;寺院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1-0104-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109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自弘传于中土便与此方文化渐相融合,并随其规模增长而形成佛教知识体系,且不可避免地为类书所吸纳和利用,从而产生类化现象。佛教知识“类化”即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组织编排的进程。关于类书之“进化”情况,闻一多先生已有相应论述<sup>[1]</sup>,而针对佛教知识的类分进程学界尚无深入梳理和发掘。本文拟从唐宋类书的发展脉络入手考察其对佛教知识的建构轨迹,并通过类编诗文集与类书的耦合关系分析,从中探寻佛教文体及文学题材的类型化演进。

## 一、类书:佛教知识类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古人对事物或知识的认知需求及方式无疑会促进书籍的变革与进步,从而产生一种“包罗万象,总括群书”的书籍类型——类书。而既为包罗万象,那么佛教知识体系一旦形成,就必当为其所“括”。

### (一)佛教知识类化的演进

探讨佛教知识类化,类书及其体例是主要观测点,这里可借鉴闻一多先生的相关论述作为考察依据。他曾说:“《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诗集。我们便看出了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初学记》)每一项题目之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

**收稿日期:**2024-01-18

**作者简介:**左福生(1971—),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佛教寺院与宋代诗歌的互动关系研究”(19XZW013)。

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sup>[1]4-5</sup>很显然,闻一多先生是针对类书之取材及处理方式谈其进化的,识度可谓精审超拔。同样,我们若对类书中某事类的引进及其分擘演变展开历时性考察,其实也是在追溯此“事”之“进化”史,但所在意的则是其由无到有、由粗到精的类化进程。

理论来说,一种“事”能为类书所“括”,首先在于其是否形成独立的知识谱系,并在文化层面得到认可。佛教知识谱系的成立可从目录图籍的著录来确认,目前所见最早载录佛教文献的目录学著作是梁阮孝绪所编的《七录》。该书在内篇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伎之外,另设外篇佛法与仙道二录,“在刘歆《七略》以降的目录学系统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中,从正面意义上确定了佛教在传统学术与知识谱系中的地位”<sup>[2]</sup>。据此,佛教知识也就具备了为类书所用的前提条件。而类书又是何时与佛教内容发生关系的呢?相传我国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时纂集的《皇览》,据《三国志》“文帝纪”载:“(帝)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sup>[3]卷二,88</sup>既然是从儒学视角于经传中纂集成书,那么,其内容就与释、道基本无涉。在现存类书中,最早纂集佛教题材的是梁释宝唱编撰的《经律异相》,这是现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且为一部专题性佛教类书,其内部已分出天、地、佛、僧、诸释等部类。

从以上大致梳理见出,在佛教兴盛之南梁,佛教不仅在传统学术与知识谱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其内部结构也开始初成体系,并形成类化趋势,如“佛”“僧”已显出类的特征。然在此前后,佛教题材尚未进入综合性类书系统,如梁徐勉编撰《华林遍略》、北齐《修文殿御览》及初唐类书《文思博要》等均未选录佛教内容。直至唐武后圣历间诏张昌宗等修纂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始明确肯定佛、道二教的应有地位。据王溥《唐会要》载,“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故“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sup>[4]卷三十六,486</sup>。这表明,此前综合性类书概以儒门知识为编录主体,释、道内容基本被排斥在外。或可以说,儒、释、道三家知识虽已各成体系,但彼此间还处于区隔状态,三教知识融合尚未形成。

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成就了日益强盛之国力,社会文化意识及自信逐渐高扬,并促进文化包容心态的形成。而释、道之兴亦使其与儒学之地位悬殊渐小,故类书于儒者之外,另设“释”“道”二部显得十分必需。如《艺文类聚》始设“内典”,佛教内容终于登堂,这在佛教知识“类化”史上颇具标志性意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的出现更具意义,是书为释道世于高宗总章元年(668)编成,凡一百卷,其主体按佛、法、僧、寺诸类分门编纂。经其统筹示范,唐人对佛教的认知应更为全面,于类书编纂者而言,则有助于其佛教意识的自觉,从而巩固佛教事项在类书中的地位。盛唐时期,类书对此内容渐有扩充,如徐坚所编《初学记》已设“道释部”,部内按“道”“释”之序分别立类,设子类若干,“释”类中分设佛、菩萨、僧、寺四子目。可以看出,编者正是以“佛教三宝”为基础范畴,并增以“寺”类,初步构成佛教题材的内容主体。

这些类目在其后的类书中被普遍沿用,如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的《白孔六帖》虽未设“道释”总目,但在编排上仍一依道、释之序展开,并且其下子目有较大扩充。特别是佛教内容已由《初学记》所设之4类增加到了7类,分别为:释教、戒律、禅定、佛、经、僧、寺,可见人们于释氏的认知愈加深广,对其内部区分也越详。

类书体例的成熟为宋代类书编纂创新奠定了基础。“宋四大书”之《太平御览》一改过去道释合编而为释、道二部分立,书中释部内容有了进一步充实,总数达六卷,子目计有10类,分别为:叙佛、奉佛、僧、异僧、经、像、戒律、禅、塔、寺。涉佛要素被进一步类化,反映出宋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其内部题材之精详建构。南宋类书数量及影响亦有可观,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现存元代麻沙本分前、后、续、别四集,全书体量大、类目多,于道释之纂亦见用心,设总目“仙佛类”,各分次目,佛类设“佛”“僧”“佛寺”三子目,并按先事后文之序编排。四库本《锦绣万花谷》分前、后、续三集,题材分类既多且杂,类目甚至多至671种。其前集佛教内容分“佛祖”“禅法”“浮图名议”“释语”四类,后集之佛教类分设“寺院”“佛祖”“浮图名议”“僧”四目。仅释部前后就出现两类相重,难怪陈振孙讥之“门类无伦

理”<sup>[5]</sup>卷十四,432,四库馆臣亦指其“琐屑丛碎,参错失伦”<sup>[6]</sup>卷一三五,1148,从以上佛教事类分擘实可窥其大略。

以上从类目之变角度梳理了唐宋类书对佛教题材的编排情况,从中反映出儒、释、道三教由彼此区隔到逐渐融合的过程。巩本栋先生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客观外界事物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事物之间异同关系的辨析和区分越来越清晰合理,反过来说,从人们对事物异同的辨析和类别的区分中,也可以看出其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认识水平,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动向。”<sup>[7]</sup>反映于唐宋类书中的佛教知识类化即可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 (二) 佛教类化促动佛教文学分疏

类书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就内容构成而言,类书一般非编者自撰,而是抄撮故实并加以分类编排,许多内容就摘自诗文。如张巍说:“依题逐篇抄录典故字句成为类书,照录全篇就是类编赋集了。诗的情况亦与此类似。到初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就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既抄撮故实,又选录诗文……先事后文,这是类书编撰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传统类书如《皇览》是‘事出于文’‘破之为事’,这里却将成篇的‘文’(文章)附于单行的‘事’(语汇)之后,相当于传统类书与类编诗文集的合一。”<sup>[8]</sup>

这使类书在推进佛教知识类化的同时,也促成佛教诗文的分类而聚,且表现为文体与题材的双向分疏。在类书史上,首开诗文附录之例的便是《艺文类聚》,《文献通考》叙曰:“分门类事,兼存前世赋诗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sup>[9]</sup>卷二二八,700核其“内典”所附文体,即标有诗、颂、赞、碑4类,这相当于在附录诗文的同时,编者也兼施了文体分类。

《初学记》的佛教题材编纂愈见清晰,如“佛”类于叙事之后续以“事对”,后再附“诗”“赞”“铭”诸篇,后者显然也是分体选文的典型做法。《白孔六帖》中的佛教类目愈多,各类之下均录诗文,所涉文体类型渐多,只是未明设文体名目。就总的趋势看,佛教文体类别基本是随佛教知识类化的深入而渐增,即便是同一文体,有些类书还作了体式细分。如祝穆《古今事文类聚》之前集“仙佛类”下设“佛寺”类,其诗选录以咏寺为主,但编者又按古、律之体分类而录,体式之分十分明确。

类书中佛教文学分疏既存在上述体式之多门,在题材方面也愈见纷繁。如《初学记》中“奉佛”“寺”诸类之下各录诗篇,若从大的题材范畴而言,所录之诗均可称“崇佛诗歌”,但从具体的表现对象来看,它们又各属不同方向,题材归属亦当有别。前文已证类书中佛教类目呈由少渐多之势,具体由《艺文类聚》的单类发展到《初学记》的4类,后《白孔六帖》增至7类,再到《太平御览》的10类。每一类即代表佛教内部题材的一个方面,各类往往有文学创作与之相应,在事文交互类聚之下,相应诗文的题材属性也各具独立范畴。

就总的趋势上,佛教知识“类化”常依现实而进,其题材分擘亦与佛教发展保持关联。如谢维新所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之前集设“释教门”三卷,其下分出“僧”“尼”“佛寺”诸类别,各类俱有引诗,此处出现之“尼”类显然是罕见类目,它的出现与宋代女子出家为尼人数大增极有关联,可见其题材的时代特色。再如《锦绣万花谷》,受众常视为诗集,原因即在其“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例附录诗篇”<sup>[6]</sup>卷一三五,1148,书中所设佛教类目也体现鲜明的题材分异,连带所选诗什也构成颂佛、咏寺、禅喻之分。

宋代为地理志编纂之高峰时期,其体例常以“分门类事”出之,故地志又被视为类书的一个分支。二者相近之处颇多,就佛教题材处理而言,地志编录的内容方式与类书做法比较相近,甚至连类目也多是照搬类书。如“寺观”“寺院”常为二者的通用目类,以反映各地佛教发展状况,并统摄相关诗文。其模式多为先叙寺史源流,再附录诗篇,一者达成“以寺系诗”的编排模式,再者也显出咏寺作品的题材属性。此类情况在《(咸淳)临安志》中表现较为集中,该书对所附诗文分别署以“记文”和“题咏”之目,既显示了分体选文之意向,同时也使所附诗文在题材上分出类别,其做法与类书的处理方式几无区分。

鉴于文学与类书的密切关系,佛教文学不仅大量进入类书,并在其体例下被卷入“类化”系统,使之于体式、题材双重维度上构成类分之势。然诗文仅为类书的附录成分,故类书中的佛教文学分疏还处于初级阶段,纂类尚不全面系统,其完善程度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实践,而这些工作正是类编诗文集将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 二、类编诗文集：佛教文学的分疏与整合

类编诗文集是宋代文献编纂中大量产生的类型化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学界研究表明,类编诗文集与类书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类编诗文集与类书最大的相通之处是它们都采用了内容分类这种编排方式。”<sup>[8]</sup>这也意味着,类书中佛教知识“类化”对类编诗文集内容将产生相应影响,甚至具有示范效应。

### (一)宋代类编诗文集的诸多形态

类编诗文集的“分门纂类”一般是在文学分体之下进行题材类分,这种编纂形式早在《文选》甚至更早即有实行,但之后乃至唐代,其模式并未成为文集编纂之主流。故四库馆臣于《姚少监诗集》提要中说:“分类编次,唐人从无此例。”<sup>[6]卷一五一,1297</sup>万曼也说:“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sup>[10]87</sup>并强调:“只有宋人编定唐集,才喜欢分类。”不过,他们的判断有失绝对,唐人分类编次文集实有诸例,如初唐刘孝孙所编《古今类聚诗苑》,其后释慧净编《续古今文苑英华》,中唐李吉甫编《丽则集》,晚唐顾陶编《唐诗类选》均为“分门编类”。但唐人分类编集之总量确实不多,宋人始致力于分门纂类,本文对宋编诗文集分以下几种类型作必要概述:

其一,类编诗文总集。如宋初之《文苑英华》,该书沿《文选》先体后类之例,“撮其类例,分以布居”<sup>[11]443</sup>,规模及类目俱为宏富。姚铉编《唐文粹》是继《文苑英华》之后的又一大型总集,体例也是分体分类,全书录入文体计16种,各体之下再依题材分类,类目亦多。总体来说,宋人类编诗文集中以诗集类编居多。如赵孟奎《分门类纂唐歌诗》,“凡唐人所作,上自圣制,下及俚歌、郊庙、军旅、宴飨……莫不类聚而分。”<sup>[12]278</sup>按题材分类亦为其特色。《唐宋类诗》也是类编诗集,《郡斋读书志》叙曰:“右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详其名字,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已前名人诗。”<sup>[9]卷二十,1064</sup>另蒲积中编《古今岁时杂咏》,所录虽只限岁时之咏,但在题材上仍作分类,即按四时节气类分,设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寒食等目。

以上诗文集大多都有辑录佛教诗文。如《文苑英华》所辑文类极广,许多文体内部都有设佛教类型。如“赋”“书”二体之下各有“道释”类,“论”体中设“释”类,“表”中有“寺观”“佛像”二类,“赞”体之下设“佛像”类,“碑”体之下设“释”类。尤其“记”体之下涉佛题材最多,总目“释氏”之下分设“寺院”“佛像”“经”“塔”“石柱”“石阶”“幢”“方丈”“西轩”及“僧”诸类。“诗”体中佛教题材主要分“释门”和“寺院”两大类,同时于其他诗类中还设有佛教之次目,如“应制”类下有设“寺院”类,“歌行”类下设“佛寺”类等。

其二,类编诗文选本。文学选本体量一般小于总集,但仍为总集之一种,如晏殊编《名贤集选》,据祝尚书先生考,是书为类分选本<sup>[13]卷一,36</sup>。王安石所编《唐百家诗选》为宋编唐诗的权威选本,此书先出并未分类,后杨蟠于元符元年(1098)对其重加编排,纂为类分本《唐百家诗选》,其中对佛、道诗有专设“僧道”类。刘克庄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今存三种版本,李更考证认为:“元刻甲本无疑更能体现原书的本来面貌。”<sup>[14]</sup>此书纂类多门,且类中又分类,模式为:门—类—时段—子目。宋末方回所编《瀛奎律髓》为一部律诗专体选本,共分49类,涉及题材36类,且各附以类序,其中“释梵类”专选佛教诗歌。

其三,类编地域性诗文集。地域性诗文集是以产生于特定地域的文学作品作为辑选对象的集子,有人称之地域总集,如谷玲玲说:“地域总集……又与别集、地方志等相辅相成,可补别集、方志等辑录诗文史料之不足。”<sup>[15]</sup>丁放则称其“地域性文学选本”,并指出,这种“收录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段内文学作品的选集”的“大量涌现是在宋代”<sup>[16]</sup>。

地域性诗文集也基本是分类编纂,如郑虎臣编《吴都文粹》、袁说友(或说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等俱为地域性诗文集,内容选录只限一州一府,其书对地方性佛教诗文辑录较多。如《成都文类》分别以“道释”“寺观”两类统摄相关诗文;《会稽掇英总集》所录亦“各有类目”<sup>[6]</sup>,

其佛教诗文主要倾向与寺院相关的作品,提要序曰:“次寺观,分云门寺等四子目,而以祠宇附之。”<sup>[6]</sup>寺院作为诗歌之题材对象于此有明确体现。

其四,类编别集。别集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但类编别集于宋前产生极少,个别如《白氏长庆集》《李峤杂咏》始见分类。宋人分门类编别集首先大量用于唐人诗集的重编再纂,如李、杜诗歌在宋代分别出现《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两部类编之作。前者为杨齐贤、萧士赟所编,其题材分类多门,但佛教之类阙如,这可能与李白的相关创作不多有关。杜诗的编纂情况则有所不同,宋代“注杜”之风极盛,因而产生大量集注与类编一体的杜诗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为其一种,并与《门类增广十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一脉相承,唯卷次先后有别。杜诗涉佛题材较多,因而对其佛教篇目有作专类编排,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先后设“释老”和“寺观”二门,其做法与《文苑英华》分聚大同小异。

宋人分门类编还大量施于本朝之大家文集,先后出现如《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类编增广颖滨先生大全文集》《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等类编之集,其类分原则均以题材为中心。苏轼为一代文豪,其诗类编最值得关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又称《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其题材分类颇细,类目达78种。另外,赵夔也编《百家注东坡先生诗》集,刊行于高宗南渡之后,但题材类分只有50种。

苏轼思想受佛教影响较深,加之他于游宦中经常造访名山、广交僧友,其诗多涉佛禅,故类分东坡诗对此类颇有强调。如《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针对其佛教诗分设了“释老”“寺观”“禅悟”及“塔”诸类目。

## (二)类编诗文集的佛教文体之分

类编诗文集对佛教文体之类分并不是仅凭单级的分体完成,而是通过分体加分类的交互形式来实现。前文对《文苑英华》之涉佛文体及其各体之下的题材类型已作相应梳理,相关文体共有8类,分别为诗、论、赞、铭、记、表、碑、赋等。这些体类并非佛教学所独有,因而其类型之成立还要经题材维度的支撑和建构。在书中,这八种涉佛文体分别有题材层面的类目及内容与之相应,所标类名有:释门、释氏、道释、释、寺院、佛寺、佛像、塔庙、谏寺观佛像、僧等。尽管名类不一,但正是经此分疏标识而使相关作品在文体、题材方面各安其位、各归其属。

《唐文粹》的分体分类也很明确,如“诗”体之下设“古调歌”类,“古调歌”类下又出以“寺观”类,前二级是分体,后者则为题材之分。另外,“赞”“铭”“记”三体之下皆设“浮图”类;“书奏”之下设“佛寺”类;“疏”体之下设“寺观”类;“碑”体之下设“释”类,等等。如此,释氏题材与某一文体结合便构成佛教文体之特殊类别,如像赞、寺碑、塔铭、行记皆出此逻辑。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给寺碑文已作如下定位:“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窃依前古,总入于集,虽俗观为烦,而道缘成业矣。”<sup>[17]</sup><sup>498</sup>这就为佛教发展过程中大量产生的碑铭之体确立了文学地位。胡大雷因而说:“北朝寺院文学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类型。它是传统文学的,其所包含的文体皆被古典文体学所认可,自不待言。它也是佛教的,佛教虽然视其为‘彼制’‘俗观’,但认可其‘道缘成业’。”<sup>[18]</sup>而这些佛教文体能被后世广为接受和延续,类书的转承附录实为一大关键,而类编诗文集的分疏整合则使其体式、类型得到更为明晰的体现。

## (三)类编诗文集的佛教题材之分

巩本栋撰文说:“《文苑英华》《唐文粹》分类之法,依题材分类,极为琐细,近于类书。”<sup>[19]</sup>依题材分类是类编诗文集的通例,但佛教题材名类会因文体之异而有所区别,并且其内部还可能产生若干细类,故反映于类编诗文集即显纷繁复杂。如《文苑英华》有8种涉佛文体均选录佛教作品,但各体中的类名却互不统一,并且有些还不止一个类目。这表明,不同文体适于表现或反映佛教的不同方面问题,这是题材分异的客观原因。而即便是同一种文体,其反映的佛教内容也有区分。比如该书“记”体之下的“释氏”类,这是个大范畴,故编者又在其下分设寺、院、佛像、经、塔、石柱、幢、方丈、僧等9个类项,这样,其题材分疏就与实际的诗文创作达成一致。

另外,从佛教诗的内部分别来看,《文苑英华》的处理方式已表现出对作品内容的独到判断,颇具创新性和引领性。其一以“释门”为类,所取侧重那些反映士僧交往之作,如李白的《别东林寺山僧》、杜甫《别赞上人》、孟浩然《寻香山湛上人》、白居易《寄山僧》等。这些诗大多涉及空门或佛理,与佛教本质关系甚密,故统之以“释门”颇为合理;其二以“寺院”为目,主要选录游寺、题咏之诗。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处于并列关系,与道教诗之分擘形式区别甚大。道教诗也存在一组与佛教题材相近的内容,即“道门”与“宫观”,但《文苑英华》对这两类作品并不作平行处理,而是把“宫观”置于“道门”类下,使二者构成属总关系。由此反观“寺院”与“释门”之分置,寺院作为佛教题材的独立价值即判然立见。

题材分类必然涉及题材判断,如何分擘其类,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编者题材观念的反映。如上所述,《文苑英华》中“寺院”诗的选录是以游寺和题咏为据,但若以此标准去裁定《成都文类》中的相关内容却会显得有些扞格相悖,原因是有部分游寺诗却被分在其他门类中。如卷九的“时序”类有录韩绛的《游鸿庆寺》诗,以及范纯仁等人所作的11首《游海云寺》诗。这该作何理解?原来这些诗虽为游寺而作,但在游寺时序上却有其鲜明特征。如《游鸿庆寺》首联道:“久旱雨初足,乐游春正深。”<sup>[20]卷九,185</sup>春游是古人的重大活动内容,编者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确认其诗主题,故将其归于“时序”类。游海云寺诸诗亦非一般性的文人游寺之作,而与当时成都地方节俗有直接关联,吴中复诗序对这一组诗的产生有述:“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sup>[20]187</sup>显然,其节俗内涵比游寺本身更具切实的题材意义,故与“寺观”类的游寺诗分门而录是有其道理的。

这些情况在类编别集中更为常见,即题材判断的深入与精确极大地改变了作品的分疏走向。佛教诗题旨往往较为难断,或两可之定,因此对其题材类分屡见异常。如杜甫的《秦州杂诗》,若仅从诗题来断,将其归于“游览”类或“杂咏”类殊无不可,但《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却是编在“寺观门”。秦州杂咏共有二十首,而编者却将其打乱,此仅选其中二首,其用意何在?其一开篇云:“秦州山北寺,胜迹隗嚣宫。”<sup>[21]卷七,573</sup>首句表明,此诗创作与诗人登游佛寺有关;其二以“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开篇,接下来才转入写景,并联系身世抒写颠沛之情。两诗感兴均因游寺而起,将其编入“寺观门”实为合理。

更为隐蔽而难断的是一些禅理诗。如《大觉高僧兰若》《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宿赞公房》《题玄武禅师屋壁》诸诗,诗题各含兰若、僧房或禅师屋等佛教空间词,凭直观判断,将这些诗分在“寺观门”应无不妥,然类编杜诗集却把诸诗置之“释老门”下,这就更需细审其诗主旨才可领会编者意图了。如《宿赞公房》诗云:“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sup>[21]卷七,592</sup>“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这里有借自然清境暗示佛教性空之意,此不难理解,但诗末之月圆描写,其佛禅意味则容易被忽视。清仇兆鳌注此曰:“《华严经》:如来于此四天下中,或名圆满月。一说此暗用释氏‘月印万川,处处皆圆’意。”<sup>[21]卷七,592</sup>文中“一说”语透露,此并非仇氏自家所见,而是转引前人解读或注释。由是观之,编者选诗分类实已超出诗题的简单设定,而触及诗家寄寓之情或兼顾注家所解。此于题材判断分疏确有进步,但也是难点所在。然编集者未必深解各诗意旨,故对注家判断和结论实有依赖,此势必促使编与注的深度结合,而宋代类编诗集往往集诸家之注于一体,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题材分类的精准化不仅改变了诗文分疏的实际走向,对于诗文集的编纂形式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如方回编《瀛奎律髓》即在常规的分设类目之外,还附以类序,这在形式上确为此前少有,其功能应为阐明题材内涵及类分依据,以便对读者阅读作出引导。书中对佛教诗的选录原则在“释梵类”序中即有表述:“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释氏之炽于中国久矣,士大夫靡然从之,适其居,友其徒,或乐其说,且深好之而研其所谓学,此一流也。诗家者流,又能精述其趣味之奥,使人玩之而不能释,亦岂可谓无补于身心者哉。凡寺、院、庵、寮题咏皆附此。”<sup>[22]卷四十七,1620</sup>经此概述,其后选诗之多门就不显扞格,特别是编者将寺、院、庵、寮题咏“附”于此类,实有透露其对此题材内部的轻重主次之分,即“能精述其趣味之奥”者乃释梵诗主体,而寺、庵题咏则居于末位。此前类书和类编诗文集对二者要么同归一类,要么分类而编,但绝无主次之别,这反映出随类编体例的发展,人们对题材类分之判定也越加精审和明晰。

宋代是佛教被彻底中国化即儒学化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作为儒学复兴主体的儒士从多方面对佛

教义理、知识实施了建构和“改造”，类书和文集也在其建构、“改造”之列。就方式而言，宋人普遍从儒学的思维视角以把握佛教知识，在处理相关文献内容时，通常是按演绎法即由一般到特殊的方式展开编排。因而所呈现的类目分置情况便是，先设释道、释氏、释门、浮图、佛仙等这些总目，次则是在此基础上衍出的佛、僧、寺、阁、碑、幢等具象范畴。同时又与佛教发展实际对接，如宋代禅宗对社会影响较大，且士人普遍有逃禅倾向，张九成甚至鼓吹“佛禅阴有助于我教者”，因而佛禅与文学关系至为密切，诗文集因禅立类也就显得极为必要。如《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设“禅悟”类，这就反映出此文化的时代需求。佛教中国化的另一表征是僧人与寺院的世俗化，故僧、寺作为文学题材使其得到了强化和凸显，如《会稽掇英总集》中分别设以“云门寺”“天衣寺”“应天寺”“天章寺”等类目，形成以寺系诗的编纂典范。而佛教在民间则更多地表现为灵验福报等神异色彩，这种民间诉求在《太平广记》的编纂中也有相应体现。该书以“异僧”“释证”“报应”为类目对佛教题材实施编排，实已彰显出特定的民间视角。

### 三、寺院诗：佛教文学类化之典型

诗文集类编促成佛教文学类型的多重面相，譬如像赞、行记、塔铭、寺院诗等都有经类编模式的分擘而其类各显、身份愈明。尤其寺院诗，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都堪称典型，其题材类型化的形成涉及以下因素。

#### （一）“寺”类的成立与定型

中国诗史上存在一“因类名诗”传统，其基本原理是先有一种典型诗题或题材，其后使用此题来称相关创作，如游仙诗、寄赠诗等皆由此习惯而来，并形成固定称谓。此思路尤为适用于那些类分而编的作品，类编诗文集的典型做法便是以类聚诗，其所设类目往往就成为“名”诗的主要依据。诗文集中最早以“寺院”为类聚诗的是《文苑英华》，其辑诗数达四百余首，题材规模极大，以“寺院诗”名之显然有其合法性。此类目在宋代类编诗文集中多有沿用，有些虽改以“寺观”“佛寺”或“僧寺”等，但实为异名同类，泾渭不分。

类编诗文集与类书之耦合甚密，且可以确定，“寺”类的产生于类书为先，而后才为诗文集所用。类书之“寺”类由来亦有渊源，中国古代第一部以佛寺为叙写对象的著作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其书对佛教道场的文化性质有充分彰显，就范畴来说，其已初具“寺”类的专题特征。而类书对佛教所施加的影响则使“寺”类的专属性更为明确。《法苑珠林》已开设“伽蓝篇”，其对佛教道场所述甚详，文曰：“原夫伽蓝者，昔布金西域，肇树福基；缔构东川，终祈净业。”<sup>[23]卷三十九,1229</sup>书中还对佛寺的“多名”性有作辨析：“或名道场，即无生廷也；或名为寺，即公廷也……”经此结撰，寺作为佛教题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形成，以“寺”为类，或与道观合一为“寺观”类，几为后来各型类书之定式。

综合性类书最早设“寺”类的是《初学记》，后如《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等均以“寺”为类目编排相关内容。《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则立“佛寺”类，名类虽异，本质实同。这些表明，“寺”在唐宋以来类书中渐已成类并定型，其题材类型得到持续巩固。

从“寺”类与“寺院诗”的关系建构来看，其发端则早于《初学记》。《艺文类聚》“内典”之下尽管未设“寺”类，但叙事与附诗的编排方式已为二者之题材应合搭建起彼此关联。“内典”开篇即围绕佛教道场展开，先后提及“浮图”“寺”“精舍”“王舍城”等佛教场所，这些正是佛教中国化之寺院的前身或由来。其后附录诗篇也多结合彼此关联，如游寺诗选录谢灵运的《石壁立招提精舍》、梁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诗》、庾信《登云居寺塔》、阴铿《游巴陵空寺》等。这些篇目后来也多被《文苑英华》的“寺院”类所辑。可以说，《艺文类聚》中虽无“寺院诗”之名，但却已存其实。之后的《初学记》《白孔六帖》均设“寺”类，类中俱有引诗。如李白的《寻山僧》《秋夜宿龙门香山寺》，杜甫的《大云寺诗》《岳麓寺诗》等，或尽录全篇，或摘其隽语，无不显示唐人造访佛寺、受其所护的诸多经历，并从世俗文人视角展现了佛教空间的独特境界。经此处理，这类诗歌的题材属性实已得到彰显，并为类编诗文集“以寺系诗”做出示范。

《文苑英华》首用“寺院”为类辑诗,并与“释门”类平行各为独立门类,其丰富性还表现在其他大类之下亦设寺类,如“应制”诗中也有“寺院”类,“歌行”类中又设“佛寺”类,“寺”的题材类型得到反复建构。特别是为适应寺院诗的实际创作成果,类编诗文集针对“寺”还形成新的类化倾向,产生若干细类。如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宫室门”下先分设宫殿、楼、寺三类,各类之下又设子目,“寺”类分设的子目可谓巨细无遗,有古寺、山寺、江上寺、借寺宿、废寺、入寺访僧、不遇、庵等诸多门类。从中可见寺院作为文学题材所衍生的丰富成果,也表明以寺院为对象的诗歌创作处于长期兴盛状态。

## (二) 寺院诗创作的长盛持久

寺院诗之所以成为类编诗文集中的一个常项大类,其另一关键原因在于此题材创作的长盛持久。

一种文学题材的形成及发展首先离不开相应的社会物质、文化条件,寺院诗创作源于佛教弘传,而佛教道场的适游性则是其生成之关键。在《洛阳伽蓝记》序中,作者对当时洛阳佛寺已颇有称叹:“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皇家受图……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而已哉!”<sup>[24]22-24</sup> 此描写见证了当时佛寺营造已致力于环境、结构及涂饰等追求。佛寺的清静美妙也极得王公卿士之欢心,他们常以此为游赏息心之地,从而感发其诗情。如书中对凝玄寺就有如下记述:“地形高显,下临城阙。房庑精丽,竹柏成林,实是净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sup>[24]167</sup> 此即为“寺院文学”的典型表征,正如胡大雷所说:“北朝寺院文学的世俗化,最主要体现在将寺院当作景观来游览。尽管寺院叙写所涉及的景观总要突出佛教情怀,而寺院游览诗让读者感受最多的是审美,佛教情怀是融入审美之中的。”<sup>[18]</sup>

南朝统治者亦重佛教,寺院之净行息心与诗情感发也有互进。普慧对南朝佛寺与文学关系有论:“据不完全统计,齐梁时期的文人咏佛寺的诗歌近二十首,其中多为奉和之作。仅虎窟山一处,因皇太子萧纲作《往虎窟山寺诗》之后,奉和之作,就有五首;奉和萧衍《游钟山大爱敬寺诗》的,也有几首。游佛寺诗歌这类作品,除了其中直接引用的佛语外,就其文学性和审美效果来看,在整个崇佛诗歌当中是最具文学价值的。”<sup>[25]131-132</sup> 对于这些作品,普慧或统称“咏佛寺的诗歌”,或名“游佛寺诗歌”,对其佛教身份有明确指认。近年来,学界对游寺诗创作之缘起及发展关注颇多,陈自力给这类诗名以“佛寺题咏诗”,并认为谢灵运是此题材诗的首创者<sup>[26]</sup>,寺院诗创作源流之长于兹可见。

唐代佛教规模更上一层,伽蓝佛院遍及诸方,故学界有人指出,唐代形成了中国诗史上寺院诗创作的第一座高峰,并相应产生寺院书写的三种模式<sup>[27]</sup>。不仅如此,当时还产生相关的诗学命题。如皎然《诗议》云:“如游寺诗,‘鹫岭’‘鸡岑’‘东林’‘彼岸’。”<sup>[28]206</sup> 这里首次提出了“游寺诗”之说,其内容当然涵括晋宋以来相继产生的游寺之作。贾岛对此类创作还赋予更为深刻的文化意涵,其《二南密旨》之“论篇目正理用”条云:“游寺院,贤人趋进,否泰之兆也。……题寺院,书国之善恶也。”<sup>[28]153-154</sup> 这种政治比附虽有其特殊用意,但至少能说明,寺院“文学场”已得到诗坛主导者的大力弘扬,寺院诗创作由自发进入了自觉。

宋人游寺与题诗亦有发扬互进。北宋张田在《荆门军景德玉泉禅院唐贤留题诗序碑》中写道:“田少与中州士人遗名者,第天下佳山水处,或道荆门之玉泉,升之栖霞、齐之灵岩、台之国清诸寺,以为四绝……故结方外之游者,迹或不至,不足为好事。”<sup>[29]196</sup> 可见宋代游寺之风亦盛,“迹或不至,不足为好事”,则透露游访名刹的重大意义。当然,这些“好事者”绝非一般民众,而主要是士大夫文人,其游寺之行常伴有题诗,对寺院诗繁兴应有极大促进。

其他名山佛寺也存在此类盛况,如润州金山寺唐以来已为绝胜,至宋而声名愈著。曾巩《金山寺水陆堂记》曰:“以观游之美取胜于天下……则天下之东驰,莫不顾慕者。”<sup>[29]五十八册,146</sup> 唐人金山题咏极负盛名,张祜、孙鲂、罗隐等诸家咏唱卓为绝调,宋人过此而竞相效仿,于是形成一种与文学相关的特殊场域。场域“指的就是那种相对自主的空间,那种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sup>[30]30</sup>,“当寺院发生或举办的活动有关‘文’,进而有作品产生,那么,寺院便具有充分的文学场意味”<sup>[18]</sup>。此用之名山佛寺尤为恰当,润州金山寺如此,苏州云岩寺等亦然。“寺之胜,闻天下,四方游客过吴者,未有不访焉。”<sup>[31]卷三十二,478</sup> 陆

游对会稽法云寺的描写亦可证此说,其《法云寺》诗云:“迎来送往此其地,素壁时见前人题。”<sup>[32]卷七十三,4034</sup>看来,人流盛多之寺大抵有利于“文学场”形成。

产生于寺院“文学场”之篇什最可能为地理志或地域性诗文集所辑录刊载。如郑虎臣所编《吴都文粹》对当地寺院题咏哀辑足多,如咏灵岩寺诗即广搜白居易、赵嘏、苏舜钦、胡宿等唐宋诗家之同题诗7首。寒山寺是此方名刹,自张继作《枫桥夜泊》诗后,此寺愈为诗家所重,枫桥寺名屡见之诗中。故该书辑枫桥寺诗极多,唐之张祜《题枫桥寺》、张继《枫桥夜泊》,宋人张师中、张孝祥、郭附等题咏皆一一见录,形成一规模不小的同题诗群。

寺院题壁是宋代寺院题咏诗创作的独特形式,其成果远超往世。如参寥《再游鹤林寺》云:“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sup>[33]10724</sup>艾性夫《荐福寺》诗云:“修廊半是题诗壁,游客多于住院僧。”<sup>[33]44434</sup>相关描写无不反映宋人游寺题诗的炽盛,寺院书写由此而被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其成果亦为类编诗文集之“寺院”类奠定坚实基础。

### (三) 寺院诗在接受需求

唐宋名山佛寺兼有“文学场”效应,寺院诗创作呈现强劲势头,其成果不仅为名山胜概、古寺风流增添异彩,也为诗文纂集提供丰富源泉。宋人热衷于为寺院诗纂类而编,一方面是这类作品数量确为可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类创作颇受读者青睐。事实表明,只有强劲的吸收需求,才可能使某一题材成为编集之常类或重点。这种接受需求首先表现于游众读者对相关题咏所施之保护或传录。如《玉壶清话》载:“郑文宝公……贬蓝山、枝江、长寿三县令……文莹顷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诗,《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厌归……’《寒食访僧》云:‘客舍愁经五百春,雨余溪寺绿无尘……’篇篇清绝,不能尽录。”<sup>[34]卷八,84</sup>这段文字生动反映出读者因深爱题诗而拟尽存之心态,此需求唯经博雅君子搜罗哀集才可切实满足,类编诗文集尤其是地域性诗集就颇能胜任此务,其“寺观”“寺院”或“僧寺”类所辑恰为“篇篇尽录”的有效方式。

宋代寺院诗在继承藉景畅理、即色即心的书写模式外,更多的是朝纪实写景和借景抒情(包括议论)的方向推进。如苏轼在寺院书写中虽有诸多禅悟激发,但也不乏《游金山寺》《游博罗香积寺》这类以写景著称的名篇佳构,尤其前者景中寄情,“全篇遂就望乡归山落想”<sup>[35]174</sup>。王安石对佛典颇有参究,佛学素养尤深,其晚年退居江宁,常游金陵诸寺,游寺诗创作大增,仅定林寺就有诗17首,但其诗多在写景而非释理。如《定林》云:“定林修木老参天,横贯东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寻石路,午阴多处弄潺湲。”<sup>[36]卷四十四,1179</sup>这与唐人张祜的“善题目佳境”即为同路,此创作取向对宋代诗学实有影响,在寺院诗评价中即强调景的刻琢。如《遯斋闲览》曰:“唐人题西山寺诗云:‘终古碍新月,半江无夕阳。’人谓冠绝古今,以其尽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题者亦多,而绝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为人传诵,要亦未为至工。若用之于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宁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sup>[37]卷十七,543</sup>“中的”即指对景的形象刻绘,以显其韵致。其结论所得实有赖于引证与比较的参互运用,而展开同类或同题诗互较,作品的引证支撑是其关键,若无类编之集,论诗恐将失去依据。

寺院诗是宋代诗学探讨的一大题材,其批评尤为惯用引证和比较。《唐诗纪事》载:“润州金山寺,张祜、孙鲂留诗,为第一篇。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诗意难尽。罗隐云:‘老僧斋罢关门睡,不管波涛四面生。’孙生句云:‘结宇孤峰上,安禅巨浪间。’又曰:‘万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檀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sup>[38]卷七十一,1056</sup>这是一则同题诗比较批评的典型范例,作者以张祜、孙鲂为金山寺留诗的“第一篇”,其潜台词既指创作时间上的先发,也有赋予其艺术水准“第一”之意。后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此命题又有接续,其评张祜僧寺诗说:“(张祜)僧寺诗二十四首,《金山寺诗》第一,亦当为集中第一。《孤山寺》《惠山寺》诗次之,此诗非亲到虎丘寺不知第四句之工……”<sup>[22]1662</sup>方回对金山寺、虎丘寺诸诗有作一定的纵、横比较,特别是要得出何者“第一”这样的结论就更离不开专辑和类编诗文集的支撑。这种接受方式想必在相当程度上会刺激寺院诗类编或专集的产生,其成果对诗家观摩取法也有极大便利。

事实上,宋人对这方面成果的纂辑整理已有成效。如宋人所称“四绝”之荆门惠泉寺,因文人题咏盛积,南宋洪适就有辑成《荆门惠泉诗集》二卷。南岳道林寺于唐宋为禅林望刹,造访者不绝,题咏亦富,宋袁皓有辑《道林寺诗》二卷行世。《宋史·艺文志》中此类专集著录颇多,所见有:《云门寺诗》一卷,《润州金山寺诗》一卷,《留题落星寺诗》一卷,《君山寺留题诗》一卷<sup>[39]</sup>卷二〇九,5399-5405。这些在过去的文献目录中几无见录之著,在宋代却大量刊行,可见其受到读者青睐重视之程度。对于这些卷册,我们可视为诗文总集或选本之“寺院”类内容的溢出单行,而这些单本卷册的刊行又可能反过来影响诗文集类编,成为“寺院”类作品的重要来源。

总之,“寺”类的定型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兴则促进了寺院诗创作之盛,使其数量大增,二者对宋代类编诗文集乃至单行诗册之编纂均有深刻影响和显著推动。

### [参 考 文 献]

- [1] 闻一多. 类书与诗[M]//唐诗杂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 伏煦. “论”体文的存录方式与汉魏六朝子集兴替[J]. 文学遗产,2023(02):30-41.
- [3]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王溥. 唐会要[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 [5]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6] 永瑤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 巩本栋. 《太平御览》的分类及其文化意义[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02):135-143+157.
- [8] 张巍. 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J]. 文学遗产,2008(03):56-62.
- [9]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4册. 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10] 万曼. 唐集叙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 宋白. 上文苑英华表[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 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12] 赵孟奎. 分门类纂唐歌诗序[M]//全宋文:第359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13] 祝尚书. 宋人总集叙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4] 李更. 《分门类纂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两种早期版本[J].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02(07):100-112.
- [15] 谷玲玲. 地域空间与作品汇编:中国古代地域总集之生成与演进[J]. 文学评论,2021(06):68-77.
- [16] 丁放,张晓利. 宋代地域性诗文集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J]. 江淮论坛,2013(02):150-157.
- [17] 僧祐. 出三藏记集[M]. 苏晋仁,萧鍊子,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8] 胡大雷. 北朝寺院文学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22(05):5-15.
- [19] 巩本栋. 《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1-10.
- [20] 袁说友,等. 成都文类[M]. 赵晚兰,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1] 杜甫. 杜诗详注[M]. 仇兆鳌,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2] 方回. 瀛奎律髓汇评[M]. 李庆甲,集评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3] 释道世. 法苑珠林校注[M]. 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4]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释[M]. 周祖谟,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5] 普慧. 南朝佛教与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6] 陈自力. 南北朝佛寺题咏诗初探[J]. 南开学报,2003(02):118-124.
- [27] 左福生.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4):94-104.
- [28] 张伯伟. 全唐五代诗格校考[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
- [29]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48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30] 布尔迪厄.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M],刘成富,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1] 范成大. 吴郡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32] 陆游. 剑南诗稿校注[M]. 钱仲联,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3] 傅璇琮,等.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98.
- [34] 释文莹. 玉壶清话[M]. 杨立扬,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5] 陈衍. 宋诗精华录[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 [36] 王安石. 王荆公诗集注[M]. 高克勤,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7] 魏庆之. 诗人玉屑[M]. 王仲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8] 计有功. 唐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9]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The Generalization of Buddhist Knowledg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Poems in Song Dynasty

Zuo Fushe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Center,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ization of Buddhist knowledge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lassifying and arranging Buddhist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after they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system of related books. The period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a concentrated period of Buddhism categoriz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t subject matter in such books showed a gradual trend, from few to many, from coarse to fine, reflecting people's systematic grasp of Buddhist knowledge and detailed construction of their internal subject matter. There is a clos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t poems and texts is especially influenc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t poems and texts, which makes them separate and integrate i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tyle and subject matter, and forms many type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mong them, temple poetry is the typical result of the compil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ategory first lies in the stereotyping of "temple" in th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m, and constructs the initial form of "temple poetry" in the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emple "literature field" and the flourishing of temple inscription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

**Keywords:** Buddhism; generalization; reference books from various sources; anthology of poems; Monastic poetry

[责任编辑:陈忻]